

五千年都邑的沉默与重光

——南佐遗址发掘记

陈国科

2025年我们又把工作转回遗址核心区，在遗址核心区西部全面揭露了“九合”之一“西三号夯土台”，并在西二号夯土台东侧发现一座大型夯土院落（二号院落），院落的核心建筑F21坐西朝东，为前堂后室、一门三道、中轴对称格局，结构与F1相似，面积达到600多平方米。西三号夯土台形制为较为规整的长方形，总面积达1700平方米。2025年的考古发掘又是一次重大的发现，不仅发现了又一组大型宫殿建筑，确认了核心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了南佐遗址核心区是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的中心轴线。这与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基本一致，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礼制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年时间，我们辗转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围的十多个地点进行重点发掘与局部试掘，在遗址周边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确定如此规模巨大的遗址在空间上的延续性、时间上的共时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这里面的内在逻辑是：先观察空间延续性，发现聚落内有稳定布局；再通过时间共时性，证明它们是同时存在的系统；最后用功能互补性，解释其社会运转机制。三者缺一不可，仅空间延续而无时间共识，可能只是不同时代的巧合；仅功能互补而无共时证明，则无法排除功能是因时代变迁而变化。

视野之拓：多学科的问题意识

在田野考古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单纯依赖田野观察和判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或者说很难一锤定音。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多学科的意识，因为，在田野中一些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根据在发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及时联系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考古现场问诊把脉，共同解决我们遇到的学术问题。众所周知，遗址的年代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注重精细化发掘，以地面为关键面，全面研究遗址形成过程（包括建造、使用、废弃过程）。建立遗址细致的地层堆积关系，反复确认遗存之间的共时关系，进而明确遗址的总体分期。我们对遗址中的多个连续剖面进行序列碳十四测年（截至目前已测过了近200个年代），建立起高分辨率的年代序列，为遗址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数据。

南佐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但是，稻米是本地种植还是远距离获取的？为此我们开展了锶同位素、植硅体分析，显示可能是本地种植的，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砖瓦的掺和物稻米，我们认为本地种植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复原了当时的气温和降水，当时的气候和环境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但是，但凡有点黄土高原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也知道，黄土的渗水性非常好，很难蓄水，因此，本地种植也只能在周围的河谷地带。如果不是河谷地带，在塬上种植，那就大不相同了，都应该是旱稻。此外，如果种植水稻，那么稻田在什么地方，这都应该是要考虑的。正是这种不断提问，才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近了。如果没有基于当时地貌、环境的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再比如，我们发现大量的白灰面，经过检测分析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就不假思索得出白灰面是烧制石灰生成的。但是烧制石灰得有石灰矿，实际情况是，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周围第四纪黄土覆盖200米厚，很难找到石灰矿。通过第四纪地质学与地晓学的学习，我们了解到黄土中有很多料姜石，甚至古土壤底部普遍有一层非常丰富的料姜石——黄土中的钙围绕着重石英等难以风化的物质在长时期淋溶作用下形成的钙质胶结。查阅文献可知，料姜石的主要成分也是碳酸钙。通过与其他遗址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南佐遗址的白灰面是用料姜石制作的，而非烧制石灰，烧制石灰的技术在更晚的龙山时代才普遍出现。

我们对南佐遗址制陶原料的科技检测结果，也进行了检视，开展了制陶工艺及原料的田野调查，并做了相关的实验考古，发现事实并不是科技检测的结果那样简单。因此，我们对科技检测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的应用一定要十分谨慎，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之所以产生与事实大相径庭的科技检测结果，归根结底是检测者不知道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遗址的背景缺乏系统全面了解。真正的多学科与考古学的合作研究应该是问题与解决的深度关联与融合，技术和方法永远是围绕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来开展的。

重光之时：收获与意义

经过近几年的工作，我们初步确认，距今5000年左右，南佐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高等级院落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超大型聚落结构。聚落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群。聚落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主要为窑洞式院落。聚落主体区向外，各主体区零星、片状散布。聚落东、北发现壕沟，南部以自然沟为界，基本构成一个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的区域，面积约60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发现一个面积约75000平方米、深6~7米的人工坑与北部的壕沟相通。如此规模巨大、布局严整的多圈层聚落，表明南佐应该是一处都邑性聚落，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

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凸显了严格的都城（邑）规划和礼制。以F1的中轴线为基准，F21、西三台的中心轴线均与之垂直。高等级院落择中而居，中轴线两侧分布大型夯土建筑。这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都邑（城）聚落中轴线。择中建宫、择中建殿的布局，开创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重要实证。

这样一个超大型聚落的规划和营建，需要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更需调动大量人力来营建，体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南佐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器物，而且组成成套出现，彰显了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复杂礼制。南佐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朱砂等珍稀物品，主要来自秦岭地区。大口缸、双腹盆、白衣陶甗、白陶等显示出与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远距离交流，进一步凸显了南佐聚落的控制力。南佐遗址的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迄今为止，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还不曾见到，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地区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聚落。其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中轴线布局的都邑、大型宫殿建筑、复杂礼制体系、资源远距物流网络的建立，都体现出南佐社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说明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区域王权，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南佐的发现为探讨仰韶文化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提供了关键材料，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我们深知，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才刚刚起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我们也做好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发现和更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视点

十大考古领队说

黄土之下：湮没的都邑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官寨镇南佐村，坐落在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和马莲河之间的董志塬西部。南佐，现在只是素有“天下黄土第一塬”之称的董志塬上的一个普通村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油菜花开了又谢，麦苗绿了又黄。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村落五千年前曾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古国。

1957年，庆阳文化馆的贺书璧参加完甘肃省文管会组织的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培训之后，对西峰镇附近的文物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西峰西南6公里处的南佐公社疙瘩寨遗址。他将情况上报给甘肃文管会，文管会委派倪思贤协同前往复查，证实这是一处较大仰韶文化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这是关于南佐考古的第一篇文献，发表在1959年的《文物》第一期上。196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岳邦湖、张鲁章等在庆阳地区文物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进行详细调查，确认南佐是一处规模很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并命名为“南佐疙瘩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称南佐遗址。

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后对南佐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计6次考古发掘工作。1984—1986年主要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闫渭清、赵建龙、赵雪野老师等负责发掘。其间，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仰松老师带研究生在此实习。1994年至1996年主要由赵雪野老师带队发掘。前两个阶段的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完整揭露了F1这座五千年前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相关成果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有报道。为了制定遗址保护规划，2014年和202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佐遗址进行重点勘探，在九座夯土台外侧发现相邻的两重环壕。

学术之始：缘起与背景

由于没有系统公布考古发掘成果，南佐遗址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加之长期以来，南佐遗址所在的陇东黄土高原缺乏系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导致对这一地区文明化进程缺乏系统认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很早就从他的学生李水城、王辉老师那里了解到南佐遗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掘成果。他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这（南佐）显然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国学研究》，2020年）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开展，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石峁、芦山沟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了我们对黄土高原文明进程的认知。南佐遗址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年代又在距今5000年前后，其所处的关键时间节点和空间节点及已有的重要发现，让其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21年，为了解南佐遗址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计业结构、社会状况等问题，进而探讨黄土高原5000年前后的文明化进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重启了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开展五个年度的工作（2021—2025）。

田野之思：聚落考古的思路与实践

聚落考古的理念意味着既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新阶段考古工作一开始便将南佐遗址定位为大遗址，按照“大考古”思路，秉持聚落考古的理念。坚持由点及面、从小到大、由内而外开展聚落考古，逐步搞清楚一个聚落的结构和布局，进而围绕该遗址在更大范围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单个聚落在区域聚落中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在五年时间能把这么大一个聚落的基本结构做得相对比较清楚的主要方法。

考古发掘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的大型殿堂式建筑F1，全面揭露以F1为中心的大型高等级院落。重点发掘核心区外围的院落，确定其与遗址核心区的关系。同时对核心区多个区域的夯土建筑进行大规模揭露。五年共计划发掘4000平方米。

通过勘探、发掘厘清南佐遗址的范围、结构、布局和功能分区；在此基础上，以南佐遗址为中心，逐步开展全覆盖区域系统调查，在更大范围认识南佐遗址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五年来，围绕南佐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350万平方米、考古调查100平方公里。初步确认遗址的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

2023年发掘开始，我们就发现了F1的前厅，并在F1的东侧发现了一排房屋F3、F5、F6，还有那座出土了高等级器物的F2。同时根据前期勘探的壕沟位置，对保存比较好的西三号夯土台西侧的壕沟进行发掘，了解了壕沟的基本情况。尤其是F2大量器物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遗址并不简单，紧接着F1的前厅白灰地面、高大墙体的揭露，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房子，保存这么好的墙体和白灰地面，出乎众人意料。

2021年由于东侧一排房屋的发现，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在西侧可能也有一组对应的房屋。于是2022年的元旦期间，我们对F1周围的1万平方米区域进行了重点勘探，发现在F1的西侧也有成排房址，同时还发现周围有道路和壕沟，壕沟的深度达到12米，宽约15米。这次勘探，为我们后面的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2022年发掘开始，我们工作的中心就是F1的南侧和西侧，这一年在南侧发现了两重大门及瓮城结构，在西侧发现了多间联排房屋及近5米厚的版筑夯土护墙。2023年对F1的东北部进行了全面揭露，新发现一座大型房址F15及院落的北门、瓮城等。至此，前后历时近三年，我们基本完整揭露出了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以F1为中心、层层递进、主次分明的院落（一号院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宫城”。

2023年至2024年，我们的注意力从遗址核心区转向了核心区外围，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遗址主体区。完整揭露了三座窑洞式地坑院，房屋涂抹白灰面，还出土了大量器物，显示出其比周围遗址的器物更加高级，但是与宫城区有明显差别，级别应该不高。为了确定遗址的范围，还对遗址周围的壕沟、人工坑等进行了试掘，遗址的范围、结构更加清晰，基本确认了南佐遗址是一个以高等级院落为中心、多圈层结构的超大型聚落。调查发现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上密集分布多个聚落，南佐无疑是仰韶晚期董志塬聚落群的中心。

这片区域发掘过，没有发现过什么重要迹象，就连钻探发现的灰坑也极为零星。在挖掘了数十个树坑之后，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在一个树坑坑壁发现了半个陶壶，周围没有明显文化层迹象，也不像灰坑，直觉应该是被破坏的墓葬中的遗物。顺势展开发掘，一片全新的墓葬区重现天日，先后在此区域发现了近60座墓葬，墓葬位置成排或成组排列，有的有意错位连续打破，为研究裴李岗遗址墓葬分期、人口构成及组织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发现了最早的小口尖底瓶，将尖底瓶起源提前了近1000年。

另一个巨大惊喜，来自旧石器遗存的超乎预期。我们原本以为，旧石器遗存只是局部零星分布，文化内涵有限，可实际发掘彻底颠覆认知。最初确认的旧石器细石器工艺遗存，测年达到了距今2.6万年，远早于我们的估计。随之对旧石器第二层遗存的确认，找到了距今1.4万年至2.2万年遗存。第三层下部的小石片工艺，将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转变的关键环节呈现出来，测年超过了3万年。旧石器遗存厚度超过8米，年代跨度从距今3.6万年至1.4万年，连续堆积、层层叠压，完整保留了旧石器晚期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文化序列清晰完整，没有明显间断。

早期阶段，使用简单小石片石器技术；中期阶段，成熟掌握石核预制技术，能剥制出细长规整的细石叶，制作出刮削器、尖状器等精细工具；晚期阶段，工艺进一步变化，以楔形窄面小石核为代表，剥离细石叶更为窄短。

中期还发现了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全流程遗物，从毛坯、半成品到染色的成品，完整再现了2万多年前先民制作饰品的全过程。这些小巧精致的串珠，是审美意识、精神信仰的觉醒，可能是人群分别的标识，也可能是交换的物品或礼物，证明早在旧石器晚期，中原先民就已拥有精神文化追求，不再是简单为生存奔波的原始人群。火塘灰层、石器加工废料、石磨盘，完整记录了先民数万年的技术演变、生活方式与环境适应。遗址地处平原岗地，实证3万年前人类已开始向平原地区开拓定居，适应近水环境，开发广谱资源。

紧接着，裴李岗文化遗存带来更大震撼。

西部墓葬区，我们新发现111座裴李岗墓葬，部分墓葬随葬品极其丰富。发现体量最大石磨盘，可谓磨盘之中的王者，初步估计加工制作时间至少需要数日。微痕及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该器物仅使用了很短时间，加工制作痕迹依然清晰可辨，加工如此体量的石器，必须远离遗址，去到至少十余公里之外的石料产地加工完成之后带回，却毫不痛惜将其作为随葬品葬于身侧，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念？对逝者的世界如何理解和重视？对重要资产的继承习惯是否尚未建立？部分墓葬或随葬较多陶壶、鼎、三足钵、石磨盘等，更是展现出内部已存在初步分化与分工。

在东部生活区，发现一座多室式建筑，周围遗存分布稀疏，室内发现多件陶塑，显示其功能较为特殊。其中部分人面陶塑刻画精细，尤其是人面獠牙形象，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空白，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人面獠牙形象之一，为探索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资料。

从绝壁低谷到惊喜不断，这场“无心插柳”让我们彻底醒悟：裴李岗遗址表面的残破不曾中断，掩盖不了地下的灿烂辉煌；千年的扰动破坏，未曾中断史前文化的绵延传承。旧石器遗存厚重连续，裴李岗文化遗存屡获新突破，两大时代遗存上下叠压，共同揭示出一幅从采集狩猎到定居农业的历史画卷。

柳暗花明：墓葬与聚落大揭秘，还原八千年前中原文化图景

历经2018年至2025年连续8年发掘，4000余平方米探方精心清理，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制度、聚落结构、生计模式、精神文化终于柳暗花明，以完整、鲜活、立体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聚落布局的破解，勾勒出裴李岗村落的大致结构。首次厘清裴李岗文化遗存分布面积达6万平方米，这在刚进入稳定定居不久，尚较为依赖采集狩猎的新石器中期来说，无疑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

东部生活区，发现多组房址、灰坑及陶窑，构成基本生活单元，实证先民已实现长期稳定定居，扎根双泊河畔营建家园。食物获取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黍、粟、稻混作农业，食物来源广泛。遗址远离石料来源地，又罕见对石器加工留下的石片，说明资源获取范围较大，应该尚有远离裴李岗的临时营地。

墓葬区此次发掘新清理墓葬180座，结合早年发掘遗存，遗址墓葬总数已达300座，南部、西部两大墓葬区，均采用竖穴土坑葬式，头南向，一般在头端随葬陶壶，表现出内部固定的葬式葬俗。核心墓葬区部分随葬品丰富，内部显示分工与分化。墓区内部多组错位打破或成排分布，显示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不同墓区或许代表了更高级社会组织，显示出社会初步复杂化。

残留物分析证实，墓葬中头部随葬的陶壶，是酿酒器具——裴李岗人已掌握红曲霉发酵酿酒技术，以粮食为原料酿酒，并将酿酒习俗融入丧葬礼仪，揭示出稻作农业扩散的文化动因。以酒器随葬成为固定葬俗，对后世数千年丧葬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多学科研究同步推进，还原出裴李岗文化的繁荣景象。农业方面，稻旱混作模式成熟，粟、黍、稻并行种植，农业生产稳定，为定居生活提供坚实保障；手工业方面，除制陶外，纺织技术已有发展，出土植物纤维与染色痕迹，掌握麻类纤维等的加工与染色工艺，服饰文化初具雏形；精神文化方面，精致人面陶塑、动物陶塑、玉管、绿松石珠相继出土，造型生动、工艺精湛，见证先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与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至此，裴李岗文化彻底摆脱模糊的文化符号形象，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有定居农耕、内部分工分化、葬俗基本统一、精神信仰显著端倪，为后续仰韶文化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起步阶段。

如今，2026年至2030年远期规划已全面启动，我们将继续深化发掘、系统研究，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万年文明走出探方，走向大众。这片黄土高地，埋藏着中华文明的远古根脉，见证着华夏先民的奋斗历程。裴李岗的故事，远未结束；文明的曙光，正照亮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辉煌征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6年6月18日

中原腹地，双泊河畔，一片看似寻常的黄土岗地，埋藏着中国史前史的厚重书页。裴李岗遗址，长期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介绍的首个遗址被写入考古教科书，无疑是考古界的“圣地”。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此首次发现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遗存；1977年至1979年，三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出墓葬、灰坑、陶窑，确立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填补了中原地区前仰韶文化的空白，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但随着考古发现，裴李岗遗址却也留下重重谜题：遗址发现的“细石器”性质不明，聚落布局、生计模式、社会结构模糊不清。从20世纪50年代初露锋芒，到70年代正式定名，再到21世纪新一轮系统性发掘，这片土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依然藏着数不尽的谜团与惊喜。我们重启发掘的历程，恰如一场穿越数万年的探险，有心栽花求突破，无心插柳获奇珍。最终柳暗花明见真章，一步步揭开史前中原的神秘面纱。

有心栽花：为破题而来，锁定旧石器晚期遗存

中原地区作为文明探源核心腹地，始终是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近二十年来，环嵩山地区调查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晚期遗址，登封方沟等一系列遗址相继开展了正式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演进序列依稀可辨。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更是将中原地区新石器早期遗存推进到万年前后，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早期的一段空白。然而，这些遗址普遍发掘面积不大，或为临时地点，或为单纯的石器加工场，或仅集中于其中某一阶段。中原大地上，旧石器晚期遗存与新石器遗存往往相互隔绝，文化序列断裂，传承关系不明，如同一条被截断的长河，让人看不清文化源流。

2016年，为探索中原地区早期新石器化进程，正式启动郑洛地区新一轮调查与发掘。目标清晰：寻找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存，建立旧新过渡年代框架，深化对裴李岗文化的认识。这是一场“有心栽花”的攻坚，我们坚信，这片厚土之下，必定藏着连接百万年人类史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书页。

调查涵盖了郑州西部、新密市大部分以及新郑市西部。我们到山地查看石料来源，到丘陵调查遗址分布与保存状况。队员们爬坡上坎、荆棘划破衣衫，扎破鞋底，每天徒步数十公里，踏遍每一道冲沟、每一处断崖。在寒风中观察剖面，在烈日下捡拾标本，不放过任何一块器物碎片，仔细观察地层堆积，记录每一处文化遗迹。随着调查深入，我们总结出了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规律，调查重点逐渐放在了堆积较为深厚的古河滩相沉积土上的台地之上。然而，要寻找既有旧石器晚期遗存又包含裴李岗文化遗存且值得开展发掘的遗址谈何容易，要么遗址被破坏殆尽，要么地处荒野远郊，工作条件极差，对于计划开展长期持续工作十分不利。

最终，我们还是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考古圣地裴李岗遗址。依据已有线索，我们推测，遗址理应隐藏着旧石器晚期遗存，又有以往对裴李岗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基础，是破解旧新石器过渡难题的理想选择。

遗址地处豫西山地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西部紧邻古洧水河湾，多级梯田遍布，断崖纵横交错。在遗址西侧冲沟，我们首先在断崖上找到石英石片及细石叶，明显是从遗址上部冲刷而来。随后在断崖剖面，再次发现石英石片、盘状石核，出自纯净的沙黄土层，层位清晰，没有后世扰动，初步判断文化堆积较厚，分布范围较大。

2018年，正式发掘拉开帷幕。我们聚焦遗址西部高台地，这里地势较高，保存完好，上部就是裴李岗时期的墓葬区。当第一件典型石叶、细石核出土时，止不住内心澎湃——细石叶形制规整平滑，连续的石核剥片痕迹明显，又位于全新世黄土层之下，确属无疑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场“有心栽花”，完美达到预期目标。填补了遗址旧石器空白，将裴李岗遗址的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到3万多年前。遗址上下叠压的旧石器与新石器遗存，实证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悠远绵长，为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人类迁徙、早期新石器化进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无心插柳：困境逢生，破敌遗址藏意外惊喜

就在我们为旧石器遗存的重大发现欢欣鼓舞时，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发掘却陷入了困境。作为文化命名地，裴李岗文化遗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启动发掘前的现状评估，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历经数千年农耕扰动、平整土地、取土建房、河道侵蚀，遗址早已面目全非。1977年至1979年发掘后，遗址恢复为耕地，核桃树、桃树成林，生活区文化层被严重破坏，大多仅存残垣灰坑底部；墓葬区边界模糊，早年发掘记录不全，已发掘墓葬与未发掘墓葬难以区分；遗址中部、北部被现代路沟、大型取土坑、村庄房屋占压，断崖陡峭、冲沟发育，文化堆积支离破碎。

前期勘探屡屡碰壁。1万平方米布设4个探孔的密集钻探，竟无法准确辨认墓葬范围，将现代房基误判为古代夯土，大部分灰坑形制探测失真，旧石器遗存更是未能及时发现。勘探结果显示，裴李岗文化遗址保存极差，核心区域破坏严重，我们一度陷入绝望：这座承载着无数期待的命名地遗址，难道真的被岁月彻底摧毁，再也无法重现昔日荣光？

沮丧之余，我们没有放弃。考古工作的魅力，就在于绝境之中藏希望，破败之下有奇迹。抱着“能多探索一点信息是一点”的信念，我们调整思路，精细化清理每一处残存堆积。先确认遗址分布范围，推断遗址可能的地位与性质；再探索社会经济结构，推断生存资源是否丰富、人口承载力高低；也忘不了建立遗址时空框架，了解遗址气候环境变迁，探索人群的环境适应与改造。

2019年，在遗址西北取土坑断面，北部房基下面，相继发现裴李岗文化灰坑，将遗址北界大幅拓展，重新确定了遗址范围可达6万平方米。对于该时期的遗址来说，面积已然位居前列，间接证实了遗址地位的重要性。浮选结果令人振奋，出土炭化黍、黍、稻等植物种子，确凿证实8000年前裴李岗人已掌握稻旱混作农业技术，是中国北方农业起源与扩散的核心实证。通过对流域及遗址旁地层、古河道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建立起遗址更新世晚期以来的河流演变模型。新发掘的两座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从陶壶中首次检测出红曲霉、酵母、大米等多种淀粉剂，初步证实了陶窑的测年功能。从墓葬出土器物及人骨中检测出染色纤维，证实了裴李岗时期已迈出纺织业专业化的重要一步。

至此，我们对裴李岗的发掘与研究最初设定的目标已初步达成，是否要继续深入下去，调查钻探结果显示了遗址极差的保存状况，令人怀疑是否还有可以发掘之处。然而我们不甘心，打算利用遗址原种植过核桃树留下的树坑，做一个地面式的调查，碰碰运气。老实说，这样的调查毫无把握，不仅1979年就在

——裴李岗遗址发掘记

李永强